



ZHONGGUO
GONGCHANDANG
CHUANGJIANSHI

刘宋斌 姚金果 著

中国
共产
党
创
建
史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创建史

ZHONGGUO GONGCHANDANG CHUANGJIANSHI

刘宋斌 姚金果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刘宋斌, 姚金果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2. 1

ISBN7-211-04006-8

I. 中… II. ①刘…②姚… III. 中国共产党—党史 N. 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9464 号

中国共产党创建史

ZHONGGUO GONGCHANDANG CHUANG JIAN SHI

刘宋斌 姚金果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福州屏山印刷厂印刷

(福州铜盘路 238 号 邮编: 350001)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19 印张 8 插页 456 千字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211-04006-8

D·347 定价: 30.3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1 震荡与变革：中国共产党创建前的国内政治环境

1.1 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课题	1
1.2 辛亥革命	4
1.3 树起民主共和的旗帜	15
1.4 政党政治的出现	23
1.5 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33
1.6 全国人民反抗北洋军阀的斗争	43

2 危机与发展：中国共产党创建前的国内经济状况

2.1 外国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51
2.2 中国农村经济状况的变动	60
2.3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66
2.4 中国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84

3 传统与嬗变：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文化背景

3.1 中国传统文化的沉淀与利弊	98
3.2 中国近代文化的嬗变	104
3.3 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	110
3.4 民国初年的新文化建设	120
3.5 陈独秀与新文化运动	136

3.6 新与旧的激战	153
4 风雨寰球：中国共产党创建前的国际环境	
4.1 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的争夺	162
4.2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172
4.3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欧洲革命风暴的掀起	175
4.4 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178
4.5 列宁和俄共（布）对中国革命的关注	195
4.6 共产国际的成立	203
4.7 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	206
5 京沪怒涛：五四运动在北京和上海	
5.1 外交新耻	212
5.2 不平静的夜晚	221
5.3 集会天安门	229
5.4 火烧赵家楼	235
5.5 营救被捕学生	239
5.6 京城总罢课	243
5.7 申城风暴	252
5.8 《北京市民宣言》	269
6 星火燎原：五四运动在全国各地	
6.1 津门风云	275
6.2 齐鲁风暴	283
6.3 江城怒火	287
6.4 湘江风雷	296
6.5 珠江腾浪	302

6.6 拒签“和约”	306
6.7 五四运动的巨大意义	317

7 百家争鸣：“五四”时期新思潮在中国的传播

7.1 “马克思”来到中国	320
7.2 昙花一现的工读互助运动	333
7.3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346
7.4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356
7.5 清除无政府主义的迷雾	371
7.6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群体的出现	386

8 群星建党：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

8.1 南陈北李 相约建党	405
8.2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	415
8.3 “北京共产党小组”的创建	424
8.4 “武汉共产党支部”的诞生	432
8.5 “广州共产党”的问世	436
8.6 “长沙共产党小组”的组建	447
8.7 “济南共产党小组”的建立	452
8.8 旅日、旅法共产党小组	454

9 喷薄日出：中共一大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9.1 中国先进分子的建党理念	457
9.2 两个洋人来到中国	469
9.3 十三名代表会聚上海	474
9.4 上海会议	486
9.5 嘉兴南湖会议	505

10 初出茅庐：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活动

10.1 中央局各项工作初步开展	517
10.2 对国际形势新的认识	538
10.3 出席远东民族代表大会和对国情认识的深化	544
10.4 第一次发表对时局的宣言	560
10.5 制定民主革命纲领	567
10.6 掀起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579
10.7 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	592
 结束语	 600
 后 记	 604

1 震荡与变革：

中国共产党创建前的 国内政治环境

大千世界中，任何一个事物的出现，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都离不开它特有的环境。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它的产生，同样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诞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初，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变化和国际环境影响的结果，也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一种必然。

1.1 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课题

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令人感叹和敬佩的古代文明。然而，在欧洲进入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进入 17 世纪中叶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欧美一些国家先后确立了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接着又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业劳动，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迅速增长，由落后于中国很快变成远远地超过中国。

反过来，中国就像童话故事里与乌龟赛跑的兔子一样，越来越陷入沉睡状态，也就变得越来越落后了。明朝中叶以后，中国

的经济生活中本来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清兵入关和清朝统治的建立使刚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就受到了摧残。虽然清朝统治者中出现了康熙和乾隆两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们在国家统一和发展经济方面采取过有效的措施，出现了后人所称道的“康乾盛世”，但是在客观上，中国毕竟是用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和集权专制的政治制度同西方国家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竞争，是无法在竞争中取得胜利的。

更可悲的是，清朝统治者不是放眼看世界，而是实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由于视野囿于一国之内，就像井底之蛙一样，以为天只有一个井那么大，盲目自大，对外面的世界不屑也懒于去关注。当时，清朝统治者头脑中考虑的是满汉关系，关心的是汉人是否在造反，而没有感觉到即将到来的外患和危机。

实际上，从明朝末年开开始，中国就已遭到外患的侵扰。东边，有倭寇在东南沿海一带活动和侵袭。西边，有葡萄牙、荷兰殖民者对澳门和台湾的侵占。到了清康熙年间，北方的沙俄开始侵犯中国的北部边疆。进入19世纪，当时的“日不落帝国”——英国，为了对外扩大市场，掠夺财富，在侵占了印度等亚洲国家后，又把触角伸向中国。1840年，英国侵略者发动了鸦片战争，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并于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强迫清朝政府订立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在英国人尝到了侵略中国的甜头后，其他欧洲人便蜂拥而来。这样，几乎所有的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都相继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在1856～1860年的英法联军对中国的战争、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战争中，外国侵略者多次侵入中国领土，其中两次占领中国的首都北京。1904～1905年，日本同俄国为争夺在中

国的权益，竟在中国领土上发动战争，使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的损失。

在仅仅几十年的时间里，外国列强对中国不断加强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侵略，强迫中国割地、赔款，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许多特权。它们在中国设立港口，建立“租界”，建造教堂，驻扎军队，划分势力范围。它们控制着中国财政和经济的命脉，操纵着中国政治和军事的实权，使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遭到严重破坏。只是由于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者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再加上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在争夺中国的问题上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中国才没有灭亡，仍保持着形式上的独立。

外国列强的频繁侵略，不能不引起中国社会原有结构的变化。外国商品和资本大量输入中国后，中国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然而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并没怀着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变为一个资本主义强国的善心，而是包藏着长期掠夺和控制中国的祸心。它们不是帮助中国人民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而是极力维持中国落后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不是帮助中国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展资本主义，而是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压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样，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虽然一方面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把一个封建的中国变成一个半封建的中国，但另一方面，它们又极力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共同压迫和统治中国人民，把一个独立的国家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

在外国列强侵略中国以前，封建统治阶级的专制、腐败和保守，是中国贫穷和落后的主要根源。在外国列强侵入中国以后，它们的掠夺和侵略，是造成中国更加落后，并阻断中国迈向近代化

和走上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道路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因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统治是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严重阻碍。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也就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因此，近代中国社会也就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解放生产力，一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就是根除外国列强在中国的势力，推翻封建势力的反动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翻身解放，建立真正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发展生产力，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这两大任务中，只有先解放生产力，然后才能发展生产力。谁能承担这两大历史使命，谁就能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谁就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成为主角。

1.2 辛亥革命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就如何抵抗外国列强的侵略，推翻本国封建势力的统治，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建立起一个独立和富强的中国，进行了艰苦的思索和探求。中国人民为反抗外敌和改变国家的现状，同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统治者进行了长期的英勇顽强的斗争。中国的农民和资产阶级先后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在中华民族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但他们所进行的斗争都先后失败了。

农民阶级始终是近代革命斗争的主力。遭受外国列强侵略和封建制度压迫的中国农民有着强烈的反抗性。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从1851年1月广西金田起义开始，到1864年天京（南京）失陷为止，前后坚持了14年，势力发展到18个省，并建

立了与清政府长期对峙的政权，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描绘了人间“天国”的蓝图。太平天国革命动摇了清朝封建统治的基础，有力地打击了西方侵略者，充分显示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性。

然而，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他们无法克服自身的阶级局限性，因而他们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具有不可避免的弱点。太平天国政权建立以后，迅速走上封建化的道路，规定了严格的等级世袭制度。自“天王”洪秀全以下都醉心于享受，生活日益腐化，高层领导人之间争权夺利，以至于发生导致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天京事变”。太平天国虽然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提出“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主张，对地主阶级也有所打击，但是并没有实行土地平分，而是采取“照旧交粮纳税”的原有政策，农村的封建经济基础和封建势力并没有真正消除。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也缺乏一种理性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感性的体验上。虽然他们不承认不平等条约，反对贩卖鸦片，但是又把信奉上帝的西方侵略者都视为“洋兄弟”。正是因为农民阶级本身的历史局限性，太平天国起义最后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和清朝封建统治者的联合镇压下，没有摆脱失败的命运。

19世纪的义和团运动是在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侵略，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灾难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场运动首先在山东兴起，然后迅速发展到直隶、北京和天津地区。义和团的战士们英勇顽强的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巨大的力量，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1900年，英、俄、日、美、法、德、意、奥等八国组成联军，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由于义和团在组织上是分散的，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它在斗争过程中提出的“扶清灭洋”的口号，虽然反映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十分尖锐的矛盾，但不可能用科学的思想武器去分析和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同清朝统治者之间的

关系。因此，这个口号有着明显的弱点和不足。同时，义和团浓厚的迷信色彩，也表现了这场革命斗争的落后面。正是由于没有新的经济基础，受到小生产意识的局限，这场运动没有能够解决民族独立问题，最终在帝国主义势力和清朝政府的联合镇压下遭到失败。

民族资产阶级是近代中国一个新型的阶级，也是一个进步的阶级。19世纪末，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初生的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一新的社会力量，虽然很弱小，却代表着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它们迫切希望建立一个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为了救亡图存，使中国独立富强，曾出现两种不同的主张和两条不同的道路，即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资产阶级维新派以“救亡图存”为口号，发动了一场颇具声势的变法维新运动，试图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面貌，在中国实行以建立君主立宪制为目标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1895年，康有为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成为维新运动的起点。维新派主张开国会，制定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发展资本主义。他们组织学会，开设学堂，创办报刊，积极宣传维新变法主张。1898年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维新。但是这个运动，只是少数知识分子、官僚依靠无实权的光绪皇帝来开展的，没有群众基础，也没有实力，变法新政只推行了103天，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就发动政变，以谭嗣同等“六君子”的流血牺牲而告终。除了留下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外，戊戌变法的成果只剩下京师大学堂和保甲制度。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表明，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走不通。

当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兴起的时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也开

始登上政治舞台。应当说，近代中国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是被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反动统治逼出来的。后来成为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和不少骨干分子，并不是一开始就主张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政府，而是经历了一条从改良到革命的道路。孙中山曾说过：“可用和平手段即用和平手段，必须用强力时即以强力临之。”^①孙中山本人开始也曾上书李鸿章，试图通过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来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富强。然而他的愿望，却遭到当时清政府实权派人物李鸿章的极其冷漠的对待。这使孙中山看到改良道路走不通，才坚定了进行革命的决心。而维新改良运动失败的血的教训，更使一些维新人士醒悟，并转向了革命。

孙中山是这一派的领袖人物，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个百折不挠的伟大的革命家。1894年，他在美国檀香山创立兴中会。这个革命团体的章程明确宣布：它的宗旨是“振兴中华，维持国体”，第一次响亮地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此后，各地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又相继成立了华兴会^②、光复会^③、日知会^④等

① 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选集》，第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② 华兴会，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1904年2月）黄兴、刘揆一、宋教仁等在长沙建立。提出“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政纲；设华兴公司、东文讲习所为活动机关。1905年7月中国同盟会成立，会员相继加入，华兴会遂停止活动。

③ 光复会，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光绪三十九年冬（1904年）在上海成立，蔡元培任会长。“以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宗旨。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部分会员加入同盟会，但仍以光复会名义独立活动。宣统元年十二月（1910年2月）陶成章又在日本东京成立光复会总会，推举章炳麟为会长，赴南洋发展组织，并在浙江、上海等地组织光复军。1911年武昌起义，光复军在汕头、浙江、上海、镇江等地响应。1912年陶成章被刺杀，光复会解体。

④ 日知会，清末湖北革命团体。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刘静庵、曹亚伯等发起组织，次年武昌正式成立。中国同盟会在湖北设分会，依靠该会进行活动。萍浏醴起义，日知会准备响应，被清政府发觉，刘静庵等被捕。日知会遂停止活动。

革命团体

孙中山继承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传统，他曾经以“洪秀全第二”自居，矢志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但他却比洪秀全大大前进了。李大钊指出：孙中山“承接了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系统，而把那个时代农业经济所反映出来的帝王思想，以及随着帝国主义进来的宗教迷信，一一淘洗净尽”^①。

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在总结太平天国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于1905年7月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参加同盟会的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日知会和二十世纪支那社等革命团体的代表。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会纲，首次提出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取代腐朽、专制的清封建王朝的革命目标。随后，孙中山将其解释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即有名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成为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正如后来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②。

同盟会的成立，基本上团结了国内海外各较大的革命团体成为一个统一的组织，并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了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组织。同时，同盟会通过制定组织章程，发布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并编拟统一的《革命方略》，因而具备了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规模。特别是在国内较有基础的华兴会、光复会和日知会等

① 李大钊：《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李大钊文集》，下卷，第8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② 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5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团体的加入，使同盟会领导下的国内的有组织的革命力量迅速增长，大大加快了革命的步伐。孙中山在谈到同盟会的成立时感叹地说：

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上，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逾万人，支部则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①

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使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新的阵容和姿态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在建立“中华民国”这一革命目标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来，革命的队伍不断壮大。

在同盟会纲领的基础上，孙中山在1906年制订了《军政府宣言》，明确提出：“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②同时，孙中山还设计了具体的民国形式，提出“五权分立”的主张，分行政、议政、审判、考试、监察五权，以弥补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不完备，希望中国的民主制度能取西方民主制度之长又能补西方民主制度之短。

正当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逐渐走向高潮的时候，中国的北方邻国——俄国爆发了1905年革命，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先进分子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俄国革命的发展情况，许

①②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201、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多报刊都经常报道有关俄国革命的消息。尤其以是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为代表的革命派报纸不断地用很大的篇幅来评述这次俄国革命。围绕在同盟会周围的革命党人，很自然地把中国人民从清朝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之下解放出来的斗争同把俄国人民从暴虐的沙皇制度之下解放出来的斗争联系起来，并通过俄国革命增强了斗争的信心。《民报》第11号发表文章指出：

今以露西亚之国，其专制政治组织之完密、强固，宜非满洲政府所望，然其国之革命志士，牺牲流血，犯难而与之争者，至今不屈。此支那革命党所赞叹而呼为同调者也。虽支那革命其情不尽同于露国，然苟使无此艰苦卓绝、百折不挠之志气，则安能屡蹶屡起，久而益振，不为彼异族之政府所歼灭耶！

中国的革命者相信，如果能像俄国人民一样艰苦卓绝，百折不挠，中国的革命也是一定能够成功的。同时，俄国的这场革命也启发了中国的思想界，使中国的革命者进一步认识到中国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再以汉族帝国去代替满族帝国，而必须走民主共和的道路，“二十世纪，苟创设新政体者，必思涤除专制惟恐不尽”，对于“旧日之为异族政府所有者，固当倾覆之，而数千年君主专制之政府，亦必同时改造”。^①此外，俄国人民在1905年抵制沙皇政府杜马（沙皇俄国时期的中央和地方咨议机关）的斗争，使中国的革命者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要走上独立富强之路，是不可能通过改良主义的立宪运动而达到目的的。

俄国1905年革命的巨大声浪以及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所

^① 《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第3号。